

谈刘禹锡诗文集的两个影宋本

屈 守 元

刘禹锡诗文集现存最早的本子是宋刻，据所知共有三个：一是日本平安福井氏崇兰馆所藏宋刊本《刘梦得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一是宋绍兴八年（一一三八年）刻本《刘宾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一是北京图书馆所藏宋刊残本《刘梦得文集》，存一至四卷^①。三个宋本，除北京图书馆所藏残本外，两个完整的宋刻，都有影印本流行。崇兰馆所藏《刘梦得文集》，一九一三年由武进董康影印（以下省称“董影”）^②；绍兴本《刘宾客文集》，在稍后的时间由吴兴徐氏影印（以下省称“徐影”）^③。两部宋刻本，一部不在国内，一部踪迹不明。两个影宋本，都用珂罗版精印，基本上反映了两部完整的宋刊本面貌，是研究刘禹锡诗文最重要的版本。下面简单谈一谈两个影宋本的来龙去脉，及其在校勘上的价值。

关 于 “董 影”

“董影”有脱页，是崇馆所藏原书如此。书前总目，即脱去第一页^④。原书封面题署，早不存在。是否有序有跋，无法知道。序跋在全书最外部分，有很大的可能在脱页之中。

据内藤虎跋语，平安福井氏所藏此书，得之建仁寺，据传是千光和尚入宋时带回日本的。千光名荣西，又称叶上，号明庵，是日本禅宗的始祖。他在仁安三年（即宋孝宗乾道四年，公元一一六八年）和文治三年（即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一一八七年）曾两次游宋。建仁二年（即宋宁宗嘉泰二年，公元一二〇二年）将军赖源家创立建仁寺，即以千光为开山^⑤。书出建仁寺，传自千光，这个说法比较可靠。千光入宋，第一次从天台带回一些关于禅宗的书，第二次又在天童（地在鄞县）学禅法^⑥。刘禹锡是喜爱禅宗的，集中颇有这类文字^⑦。千光把这部集子带回日本，完全在情理之中。这部书由千光带回，其刻版当在宋孝宗以前。

根据一些材料推断，可以初步确定：“董影”的底本是一个蜀大字本，刊于绍兴初年（十二世纪三十年代）。

“董影”每半叶十行，行十八字，底本版框高八寸六分，宽六寸四分。“字大栏豁，疏朗悦目^⑧”。其为大字本，无须多说。

“董影”字体方整厚重，具有宋蜀刊本的特征。但把它定为蜀刊本，显然不能仅仅

根据这种出于“望气”的揣测。有个可靠的证据：《文苑英华》卷九百八十八载刘禹锡的《祭柳员外文》，在“朋友制服”句的“制”字下，有一条校语，说：“蜀本作‘则’^⑩。”今检刘集诸本，此文皆在《外集》卷十。这个字，“徐影”同于《文苑英华》，作“制”，通行本^⑪亦然；惟独“董影”作“则”。这是一个明证，“董影”之为蜀本，确然可知。

断定“董影”是蜀刊本，还有一个线索：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以下省称《晁志》）卷四上著录“《刘禹锡梦得集》三十卷，《外集》十卷^⑫。”书名卷数皆与“董影”合。《晁志》所著录的书绝大部分是四川转运使井度赠送给他的^⑬。井度的书，主要从四川收集。《晁志》自序曾讲到井度收书的情况，说：“时巴蜀独不被兵，人间多有异本，未尝不力求，必得之而后已。”因此，《晁志》里的书，特多蜀刊“异本”。这部《梦得集》的版本，与“董影”相同，是蜀大字本，可能性是很大的。

此本既著录于《晁志》，就可以推定它的刻版时代。井度任四川转运，在绍兴十一年至十四年（一一四一——一一四四年）^⑭，广收蜀中“异本”书籍，便是这时候的事。蜀大字本是井度所收以赠晁公武者，其刻版当在绍兴十年（一一四〇年）以前。《晁志》写成于绍兴二十一年（一一五一年），但里面所著录的书，除井度所赠者外，便是他家“旧藏”^⑮，不可能有井度赠送以后新增之书。证之“董影”避宋帝讳缺笔，止于高宗赵构之名，卷六第八页上孝宗之名“慎”字、卷三第六页下光宗之名“惇”字，都不缺笔画。其为绍兴时代刻版，毫无问题。再据井度收书的时间，断定它是绍兴初年刻本，是可信的。

从“董影”书版中缝的刻字工人署名，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它是蜀刊本的证验。这些工人的名字，有单隆、单达、任显、任达等，单、任两姓的刻字工人在宋蜀本中是常见的。今存有九百四十五卷之多的宋蜀刊本《太平御览》，是宁宗庆元五年（一一九九年）刻成的^⑯。其时距绍兴之初，已有六十年光景。《御览》的刻字工人如单远、单阿亥、单轮保、单阿回、单桂一、单桂二、单寿三、单寿四、单和九、任通、任宏等，属于单、任两姓的不少。南宋初期的刻字工人，用他们自己的铁笔，纪录了当时手工业工人家传技艺的历史实况，也给我们鉴定这些书籍版本的雕刻时代和地区留下了可贵的资料，这是我们应该珍视的^⑰。

以《刘梦得文集》作为标题这个蜀大字本，宋明以来在国内流传的情况，已无法确知了。写作时间比《晁志》稍晚、记载尤袤家藏书的《遂初堂书目·别集类》，著录有“《刘禹锡外内集》”，是否这个版本，殊为含混。十三世纪四十年代陈振孙编定《直斋书录解題》（以下省称《陈录》），其《别集类》（《聚珍版丛书》本卷十六；以下引《陈录》，皆据这个版本）《王右丞集》条下，提到“蜀刻唐六十家集多异于他处本”，这个版本可能即是“蜀刻唐六十家集”的一种。明代晁瑛《宝文堂书目》卷上《文集》类著录“《刘梦得文集》”，名与此同，但不能完全确定就是这个本子，因为以《刘梦得文集》为名的，还有一个与“董影”编排不一样的版本^⑱。这些收藏者著录上的简略，给考查这个版本的流传，带来了困难。

董康把这个在国内失传已久的本子，从日本影印回来，值得肯定。商务印书馆《四

部丛刊》（以下省称《丛刊》），采用“董影”重印，本是件好事。但由于校印时的疏忽，没有能真实地反映“董影”面貌，而且造成了许多不应有的错误。第一，“董影”缺脱或不显的字，《丛刊》本许多地方把它描润补全，这种作法已很不妥当，更严重的是，在描补的时候，无根据地随意乱改，例如：

卷一第八页上最末一个字，“董影”缺脱左下方大部分，这个字“徐影”、通行本及《全唐诗》都作“画”，而《丛刊》本却把它描补作“书”。这本是《游桃源一百韵》中的句子：“自迷希古心，妄恃干时画。”把“画”字误补作“书”，不但语句不通，而且也失了韵。

卷五第七页下第一、二、三行之末，“董影”都有脱缺，《丛刊》本全部补完。第三行最末的一个字，“徐影”、通行本及《全唐诗》都作“花”，而《丛刊》本却毫无依据地补成“若”字。这是《西山兰若试茶歌》中的句子：“白云满碗花徘徊。”把“花”妄改为“若”，怎么通？

“董影”原书本可辨认或并不缺脱的字，也往往被《丛刊》校印者随意乱描，例如：

卷五第六页上第八行最末一字，“董影”作“駟”，字形犹可辨认，《丛刊》本却把它误描作“驛”（“徐影”同“董影”作“駟”）。

卷九第六页下第二行最末两个字，“董影”虽稍模糊，但仍隐约可辨是“人曰”二字，《丛刊》本却据《全唐诗》把“曰”字描改作“云”（“徐影”和通行本同“董影”作“曰”）。

卷十一第一页下第三行倒数第三字，“董影”并不缺脱，清清楚楚地是一个“社”字（“徐影”、通行本及《文苑英华》卷九十八引同），而《丛刊》的校印者却随意把它描改成“杜”字。

《外集》卷三第十一页上最末一行倒数第二字，“董影”并不缺脱，分明是一个“文”字（“徐影”同），由于有些人不懂“文瓜”之称，通行本及《全唐诗》竟改为“木瓜”，《丛刊》的校印者也妄将原本“文”字抹改为“木”字。

《外集》卷五第三页上第八行最末一个字，“董影”本作“田”，由于字中有缺脱，《丛刊》竟描改作“曰”（“徐影”、通行本及《全唐诗》皆作“田”）。

这里所举的仅仅是一部分具有典型性的例子，其他异体或义可两通的文字，统统没有计入。

第二，“董影”的缺页，《丛刊》全部抄写补齐，而且在抄补之叶左下角标明“据结一庐本补”。这完全靠不住。结一庐本无总目，而且编次先文后诗，标题为《刘宾客文集》，这些地方全与“董影”不同，《丛刊》本第一页本是结一庐本所没有东西，何以能据补呢？其他抄补之叶，如卷三十第十一页，用结一庐本比对，竟有三字不同。《丛刊》本的抄补，不但不能反映“董影”原来面貌，而且对结一庐本也犯了肆意乱改的错误。

《丛刊》出版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那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上海商场，出现这种现象，本无足怪责。但我们若不经比对，便用这个本子代替“董影”，却是不合乎科学的。

关于“徐影”

“徐影”书末有常山宋敏求后序及广川董菴题记，对于此书辑刻原委，讲得比较清楚。从宋氏后序知道，《外集》十卷是他补辑的。从董氏题记知道，这个经过宋敏求补辑的本子出于他家旧藏，《文集》参校了“郡居士大夫家”和远方“亲旧”的十余种本子，而《外集》则仅有他家藏本。

董菴字令升，东平人，是《广川书跋》、《广川画跋》作者董道之子。他家所收藏的金石书画颇为丰富，他家藏书目录《广川藏书志》二十六卷，著录于《陈录》卷八，《陈录》曾多次引用。董菴在绍兴初年任左朝散郎、广西提点刑狱公事，后以赵鼎之荐，历吏部员外郎，中书舍人，兼权礼部侍郎，充集英殿修撰、知衢州，旋罢，提举江州太平观，复充徽猷阁待制、知严州^①。《刘宾客文集》就是他知严州时刻印的。据淳熙丙午（十三年，公元一一八六年）陈公亮、刘文富纂辑的《严州重修图经》卷一《贤牧》所附《题名》：“董菴，绍兴七年（一一三七年）十一月初三日，以左朝奉大夫充徽猷阁待制，知；绍兴九年（一一三九年）八月初五日，罢任。”《刘宾客文集》题记署“绍兴八年（一一三八年）秋九月壬寅（十九日）”，正是他在严州任中。所谓“郡居士大夫”的“郡”，即指严州，严州又称新定郡（治今建德）。董菴在严州任内，曾修《严州图经》，辑《严陵集》，雕印《世说新语》、《刘宾客文集》。这些书都载有他写的序跋，《世说新语》跋署“绍兴八年夏四月癸亥（初八日）”，比《刘宾客文集》雕印时间早；《严陵集》和《严州图经》都编辑于绍兴九年，书成不久即罢任。董菴在严州任内因“祷雨不虔”，受到“无忧民闵雨之意”的指责^②，然而他对于文献方面，甚为重视，是有成就的。

据陆游的《世说新语》跋文讲，董菴所刻的《刘宾客文集》版片，在陆游知严州前，已“废于火”，“《世说》亦不复在”。陆游到严州，才把一起被火灾的《南史》和这两部书重刻^③。陆游起知严州在淳熙十三年（一一八六年）^④。那时距董菴刻成《刘宾客文集》四十八年，而此书版片早已“废于火”。董氏初刻本摹印数量是一定不会很多。后来所称“浙本”，往往即指陆氏重刻之本。《文苑英华》卷九百八十八载《祭柳员外文》，“形于冥书”一句，“冥”字下校语云：“浙本作‘其’。”今查此字，“董影”、“徐影”皆作“具”。惟“徐影”的“具”字顶上一横略有缺脱，然其为“具”字，仍确然可辨。通行的朱氏结庐《剩余丛书》本此字却作“其”，同于《英华》所称“浙本”。据此可推定：作“冥”者《英华》；作“具”者董氏原刻（与“董影”，即蜀大字本同）；作“其”者陆氏重刻，盖因董氏原本“具”字上横脱失而误，明清抄、刻诸本大抵源于陆刻，故《剩余丛书》本作“其”。周必大、彭叔夏校印《文苑英华》，在陆刻印行之后十五年左右，其称引“浙本”，已仅据陆刻，则董氏原本当时即成稀见之物了^⑤。通行本皆无宋氏跋文及董氏题记，可能陆氏重刻时已削去。《陈录》卷十六著录“《刘宾客集》三十卷，《外集》十卷”，观其书名题署及所叙释，都可确知系

董氏原刻。“徐影”宋董题跋俱全，与《陈录》著录者为同一版本，毫无疑问。《晁志》、《陈录》是宋代最著名的两部书目，它们所著录的两部刘集，都刻于绍兴初年，蜀刊大字本即“董影”，浙刻董氏原本即“徐影”。两部影宋本的确为我们提供了鉴定这两个珍贵文物的重要资料。

“徐影”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二字；版框高四寸八分，宽三寸四分，底本是否大小如此不可知，但比蜀大字本狭小是可以肯定的。卷十三脱去第三、第六两页。底本在明代曾经华夏、项笃寿收藏，有“华夏”白文印，“真赏斋”朱文葫芦印，“项笃寿”白文印，“万卷堂藏书记”朱文印^②。丰坊为华夏写的《真赏斋赋》，提到华氏“传自宋元，远有端绪，牙签锦笈以为藏，天球河图而比重”的珍本书籍，即举有这部“《刘宾客集》”，原注云：“共四十卷，内《外集》十卷。”丰坊的赋作于嘉靖二十八年（一五四九年），而项笃寿成进士在四十一年（一五六二年），此书由华入项，当在项笃寿成进士以后，踪迹是比较清楚的。据朱彝尊说，项笃寿所收藏的文物到乙酉（清顺治二年，公元一六四五年）南明王朝溃灭以后才散失^③。这部书在清代流传的情况，就不见于记载了。

吴兴徐氏将这部书影印流行，是有功的。在“徐影”问世以前，对于由浙刻衍出的通行刘集诸本来龙去脉，很不容易说清楚。王国维没有见到“徐影”，他在《两浙古本考》卷下《严州府刊版》里竟将“董影”列入，认为此即陆氏重刊本。以蜀为浙，张冠李戴，显然错误。

“董影”、“徐影”的比较

“有比较才能鉴别^④。”鉴别古代刻本的优劣，必须遵循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这里试从两个影宋本的书名题署、编排次序和文字异同各方面作比较，举些例子来说明我的初步看法。

两个影宋本的书名不同：“董影”称《刘梦得文集》；“徐影”称《刘宾客文集》。这正象王维的集子，蜀本称《王摩诘集》，而建昌本却称《王右丞集》^⑤，集子的标题用作者的字号，而不用官称，当时蜀本往往如此。名称不同，本无关宏旨。但从两《唐志》及晁、陈诸家所著录的情况看，似乎以官称作集名，北宋以前还不普遍。宋敏求曾经参加《唐书·艺文志》的编辑工作，那里面所著录的刘禹锡诗文四十卷，犹称《刘禹锡集》，而不标《刘宾客集》之名。《刘宾客文集》这样的名称，很可能即出于董菴刻印时所定。宋敏求后序，一开头即说，“世有《梦得集》四十卷”；下文谈到《外集》，又说，“合为十卷，曰《刘宾客外集》”。前后矛盾，很难理解。载有这篇后序的《外集》，只有董菴家藏，“更无它本可校”，难道他不会为了统一《刘宾客文集》之名，而有所改窜吗^⑥？“董影”题《刘梦得文集》或者更近于宋敏求所编订的原本面貌。

“董影”、“徐影”的《外集》十卷在编排次序上并无不同，而《文集》三十卷则差异很大。“董影”先诗后文，“徐影”先文后诗；诗文中各卷先后，又不一样。为了

诗十卷的移易位置，便是董菴所为。殊不知所逸之诗大抵是唱酬联句之作，安排在古今体诗十卷之前，成何体统？宋敏求以前未逸的刘集决不会是这个样子。“徐影”最混乱无章的是十卷诗，把“五言今体”摆在“杂兴”之后，“古调”之前，一望而知其为随意放置。这倒可以看出董菴变换宋敏求原本样式的痕迹。从《文集》的编排次序讲，“董影”确是远胜于浙刻（即“徐影”）的通行本，可惜内藤虎并没有把真正的优点找到。

从文字异同上讲，“董影”、“徐影”各有优点。以刘禹锡的一首一千字的长诗《游桃源一百韵》为例，此诗“董影”在卷一，“徐影”在卷二十三，除注文及异体字、通假字不计外，两本共有异文五处：

“渊明著前志”，“董影”“明”作“名”。案，原诗自注“见陶先生本记”，“徐影”作“渊明”为是。

“纵目环楚泽”，“徐影”“环”作“还”。案，此指周围，“董影”作“环”为是。

“夤缘且忘疲”，“徐影”“夤”作“寅”。案，“夤缘”是联绵字，意指攀附，左思《吴都赋》、韩愈《古意》字皆作“夤”，“董影”作“夤”为是。

“善祝拟满百”，“徐影”“拟”作“期”，两本皆可通。

“苦志徒食槩”，“董影”“槩”作“藜”。案，黄槩味苦，故以食槩描写苦志。藜是酒曲，与苦无涉。

从这首长诗来看，两本不同的文字，一千字中仅有五个。五个之中，“拟”与“期”义可两通；“环”、“夤”以“董影”为是；“明”、“槩”以“徐影”为是。恰恰是一半对一半。说两本互有优劣，这样判断是准确的。

但“董影”有特殊优异之处。《外集》卷四《酬乐天咏老见示》：“多炙为随年”，“徐影”“炙”作“灸”，显然是个错字。这个诗是刘禹锡六十五岁以后居洛阳所作，老年不宜多灸，这本是医学常识。刘禹锡晚年最亲密的诗友白居易，同住洛阳，正是在这个时候写有《罢灸》一诗，说：“休将火灸灸浮云^④。”白居易已因老“罢灸”，刘禹锡怎么会要“多灸”呢？这个字必须从“董影”作“炙”。炙是炮制肉干。《礼记·王制》讲“养老”之法，谈到“五十”到“九十”老人的膳食要求，说：“六十宿肉”。孔颖达的《正义》解释说：“六十宿肉者，转老，故宿肉在帐下，不使求而不得也。”“多炙”即是使肉可宿在帐下的一种办法。《正义》总释“五十”到“九十”的膳食要求说：“自此以下，杂记卿大夫士及庶人年老节制，在家自养之法，随年为品也。”“随年”两字，正出于此。刘禹锡年过六十五岁，所以使用了这个故实。他做诗是很讲究遣词用字要有依据的，《刘宾客嘉话录》记载他欲作重阳诗，押一“糕”字，“寻思《六经》竟未见有‘糕’字，不敢为之”。宋代宋祁借这件事，来作《九日食糕》诗，说：“刘郎不敢题糕字，虚负诗家一代豪^⑤。”后来传为文苑趣闻。“多炙为随年”一句，正表现了刘禹锡在诗歌写作上的这一特点。我们当然不相信儒家编造的那一套“养老”之法，也并不认为刘禹锡这样写诗值得效法，但《五经正义》为当时士子所必读，“为诗用僻字须有来处^⑥”又确系刘禹锡的一贯主张，这是历史事实，我们决不能用唯心历史观来抹杀这一事实，轻作判断，妄下雌黄。“董影”、“徐影”的这类文字异同，不经过细致的研究，是很容易把优劣弄颠倒的。

“董影” “徐影” 与通行本的比较

明清以来通行的抄本、刻本刘集，在书名题署、编排次序方面，基本上属于《徐影》系统，但在文字方面却与“董影”“徐影”有颇多的差异。仍以《游桃源一百韵》为例，通行的朱氏《剩余丛书》本，除异体字、通假字不计外，与“董影”“徐影”不同的字共有七个：

“连山郁岑寂”，朱本“山”作“日”。此句写山势，乃承上句写沅江而来，下句“回流抱绝巘”，即江山合写，“日”字显然错误。

“药检香芬氤”，朱本“药”作“蕊”。“药检”，指有标签的药封，“蕊检”不成词，“蕊”系错字。

“霓衣何飘飘”，朱本“衣”作“裳”，义可两通。

“前事尝被谪”，朱本“尝”作“常”。被谪只有一次，“常”字误。

“唯余步纲势”，朱本“纲”作“江”。道士修炼有“步三纲之法”，见《太平御览》卷六百七十九引《金简玉字经》，作“江”者误。

“自迷希古心”，朱本“迷”作“述”。此“自迷”与下句“妄恃”都是自嘲口气，作“述”者误。

“纵无西山姿”，朱本“姿”作“资”。这里用“姿”字，从郭璞《游仙诗》“奈何虎豹姿”脱化而来^②，作“资”易与资财义混。

这首一千字的长诗中，“董影”与“徐影”相异的不过五个字，而朱本与“董影”“徐影”两个本子都不同的却有七个字；七个字中，除“裳”字可以不计外，其余六个字都证明是朱本错误。前人说：“宋版不必尽是，时版不必尽非；然较是非以为常，宋刻之非者居二三，时刻之是者无六七^③。”这个说法经过调查统计，征之朱本与“董影”“徐影”的比较，它是较可信赖。

再举两个较为突出的例子，说明“董影”“徐影”的确比通行本可贵：

《效阮公体》的第一首：“人生不失意，焉能慕已知。”“慕”字，“董影”、“徐影”皆同^④；而朱本却作“暴”。这两句分明是从《文选》卷二十九所载张华《情诗》：

“不曾远别离，安知慕俦侣”脱化而来。《尔雅·释诂》把“知”和“雝”都训为“匹”，郭璞注：“雝，犹俦也。”“知”字之义，和“俦侣”相通。“已知”，自己的知交，自己的同伴，即指他的始终不渝的好友柳宗元等^⑤。“慕已知”与“慕俦侣”是一样的句式。这两句讲的就是《史记·汲郑列传》里“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的道理。明清抄刻本误“慕”为“暴”，校者不读《文选》，不知订正，竟自习非成是。在“四人帮”吹捧“法家”的影响下，有人为了抬高刘禹锡，特地把“暴已知”解释成“暴露出自己的幼稚无知”。那种“拉旧来帮新^⑥”的作法，我们不敢苟同。

《外集》卷一《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到郡翻似烂柯人。”“董影”、“徐影”两本皆如此^⑦。明以来抄、刻诸本一律改“郡”为“乡”，几乎所有编选这首诗的，都把“郡”字作为误文否定了^⑧。其实这个字是否有误，还得研究。后人把宋本

的这个字改为“乡”字，唯一的理由，就是认为“郡”是去声，放在这里不调平仄。

“郡”读去声，唐以后韵书、字书确系如此。但现存韵书实皆五代以后传本，根本不能全面反映唐代语音实况。《释名·释州国》和《艺文类聚》卷六引《风俗通》都以“群”训“郡”，安知刘禹锡当时的“郡”字，没有一读为“群”的浊平声调？刘禹锡很喜欢采用不同寻常的音读，《刘氏集略说》的“誉”字和“课”字，一般读去声，但刘禹锡却采用其平声读法，在两个字下都注明：“平”^⑤。这里的“郡”字何尝不可沿用此例？当然，“誉”和“课”有平声音读，反映在《广韵·上平声·九鱼》和《下平声·八戈》中，而“郡”可以读平声，今已无书面记载，因此，以“乡”代“郡”，从无人怀疑。若作“乡”字，只能指他先人坟墓所在的洛阳，这时刚到扬州，便悬想到洛阳，不但与上下文不贯，而且文不对题。作“郡”，即指扬州。扬州大都督府领扬、滁、常、润、和、宣、歙七州，天宝元年（七四二年）曾改为广陵郡^⑥。和州即属扬领，刘禹锡离和州刺史任到扬州，故称“到郡”，文义很明白。刘禹锡的父亲刘绪死于扬州，后来刘禹锡又在扬州为节度使杜佑掌书记^⑦，所以使用《述异记》卷上《烂柯人》的故事，甚为妥切。两个影宋本的“郡”字异文，是必须下细研究，妥善处理，不能轻易否定的。

上面仅仅是举的几个有一定代表性的例子。经过初步比较，“董影”“徐影”的佳胜之处，实远非通行诸本所能及。毫无疑问，两个影宋本是现存刘集最好的版本。

※ ※ ※

写完这篇刘集两个影宋本的校后记，不免想到一些问题。恩格斯指出：“即使只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⑧”。要研究一个作家，把他的作品的各种重要版本认真地比较鉴别，去伪存真，这就是对于资料的批判地审查的初步，是一项要求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妄图歪曲历史，隐瞒真象，疯狂反对这种脚踏实地的科学研究。国民党特务张春桥对鲁迅著作出版工作，狂妄叫嚣：“不要搞繁琐考证，不要搞成专案。”这家伙可算一语道破了“天机”。原来审查、掌握大量历史资料，就是“繁琐考证”；搞“繁琐考证”，就会使这个历来反对鲁迅的“狄克”大现原形，势必把鲁迅著作出版工作变成清查这个国民党特务的“专案”！图穷匕见，这个家伙赤裸裸地攻击历史唯物主义，其目的在隐藏自己的狐狸尾巴。在反对所谓“繁琐考证”的幌子下，“四人帮”拚命阻拦从崎岖小路攀登科学高峰，却诱人走“最省力”的迷途“捷径”。“世界上有只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⑨。”这股“最省力”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妖风曾经刮到对唐代诗人刘禹锡研究的阵地上来。“四人帮”歪曲刘禹锡的作品，干了不少坏事。这伙黑帮的流毒和影响，在各个领域里、各条战线上都不可低估，在刘禹锡研究阵地上同样不可低估。即在本文所涉及的对刘集现存最早版本的比较鉴别问题上，便存在着存而不论、熟视无睹的不正常现象。写这篇校后记的目的是希望借此引起对刘禹锡研究中一些具体问题的注意，为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做一点力所能及的

拥替工作。在英明领袖华主席向科学研究进军的伟大号召鼓舞下，我相信关于刘禹锡的研究一定会出现可喜的新局面，象恩格斯所说的，在这个单独的实例上解决“发展唯物主观点”的任务，正等着实事求是的研究者去完成。

注：

(1)这个宋刊残本原是黄丕烈所藏，见《思适斋集》卷一《百宋一屋赋注》，又见《百宋一屋书录》。后为常熟瞿氏所有，见《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九。今藏北京图书馆，见《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卷六。

(2)据董康跋，此书在日本印了一百部。据我所见，四川省图书馆收藏两部，纸质、边幅、刷印、装潢，优劣悬殊。疑董氏百部之说不可信。

(3)这个影印本无刊印题志，只是在《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卷十五郎章《续录》中提到它是“民国吴兴徐氏影印宋绍兴刊本”。近承潘景郑同志见告，吴兴徐氏乃徐森玉先生。当时徐森玉先生假得此书，即驷资影印，不言得之何处。今此书底本踪迹不明。

(4)“董影”脱页，除总目第一页外，尚有正集卷三十第十一页，《外集》卷三第十三、十四、十五共三页；此外，正集卷五第二页下及第三、四页，也是脱去补写之页。这些脱页大抵在卷首、卷末，接近外部的地方。

(5)、(6)见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三十七《礼俗志》四。

(7)“董影”卷七全是送僧诗（“徐影”在卷二十九），卷三十全是释门碑铭记赞（“徐影”在卷四），此外尚有这类文字。

(8)见内藤虎跋。董康影印缩为高六寸一分，宽四寸四分，故内藤虎谓之“纸幅稍蹙”。

(9)《文苑英华》的校语是宋嘉泰元年（一二〇一——一二〇四年）周必大刊印此书时彭叔夏所加的。《文苑英华》卷七百五十载刘禹锡《华佗论》，其校语三引《川文粹》，一引“蜀本”，那里的“蜀本”即指《川文粹》，与刘集无关（《华佗论》见“董影”卷十二，“徐影”卷五；《英华》校语所引《川文粹》乃指南宋时眉山成午所编《唐三百家名贤文粹》，见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卷五及顾千里《思适斋集》卷十五《唐文粹跋》）。《祭柳员外文》，《英华》校语但引“集”，不引《川文粹》，其所称“蜀本”系指刘集无疑。

(10)本文中所述的通行本，一般系指《结庐朱氏剩余丛书》本《刘宾客文集》，因为它原出明抄，又最流行，比较有代表性。关于明清抄本刻本各种刘集的优劣比较问题，将另文论述，这里不涉及。

(11)此据袁州本，衢州本卷十七无“梦得”二字。

(12)见袁州本《晁志》自序。关于井度、晁公武事，可以参看钱泰吉《甘泉乡人稿》卷九《曝书杂记》下、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五《衢州〈郡斋读书志〉跋》、清末四川翻刻衢州本《晁志》所附钱保塘《晁公武事略》、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一。

(13)据钱保塘《晁公武事略》。

(14)见《晁志》自序。

(15)据蒲叔献题记。这是一部有千卷之多的大部书，不可能短期刻成。其开始雕刻，当在光、宁之间，即十二世纪九十年代初。

(16)日本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卷二记载《太平御览》庆元刻本，把刻字工人名末的数字全部删去，单桂一、单桂二只称单桂，单寿三、单寿四只称单寿；另有个王道七，也只称王道。若此，则“董影”刻字工人也有王道，两者同名。若系一人，则刻《御览》时至少已近八十岁。恐不可信。刻字工人名末的数字，乃是弟兄行第，不能删去。王道七与王道非一人。岛田翰的记载不可靠。

(17)黄丕烈所藏《刘梦得文集》宋刊残本，名与“董影”同。但其所存一至四卷中，已有《杨岐山故广祥师碑》（见《百宋一廛赋注》）。案此文“董影”在第三十卷，“徐影”在第四卷，是其编排次序同于“徐影”，与“董影”名同而实异。

(18)、(19)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十、七十四、九十二、一百五、一百八、一百十一、一百三十，《宋会要·职官》七十（新印印本第三九五五页），《宋史翼》卷二十七，《藏书纪事诗》卷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七。

(20)这个跋文和董莽的题记，都见于明袁氏嘉趣堂刻本《世说新话》。陆跋尾署“信熙戊申（十五年，公元一一八八年）重五日”，未收入《渭南文集》。

(21)见钱大昕《陆放翁先生年谱》。

(22)刻于庆元六年（一二〇〇年）的魏仲举《五百家注音辨唐柳先生文集》附录刘禹锡《祭柳员外文》作“形于具书”，下文“朋友制服”句亦与“徐影”同，则其所据犹是董氏原刻之本。

(23)华夏字中父，项笃寿字子长，有名收藏家项元汴（子京、墨林）的哥哥。“真赏斋”是华夏的斋名；“万卷堂”是项笃寿的堂名。关于华、项事，可参看《藏书纪事诗》卷三。“华夏”白文印钤在每册副页，《天禄琳琅书目》卷三所著录宋版《九家集注杜诗》、《兰亭考》，又《后编》卷十二所著录明版《春秋经传集解》，皆系如此。另有“辽西郡图书印”朱文图记，《天禄琳琅书目》卷二所著录宋版《唐宋名贤历代确论》，也钤有此章，未知是谁人之印。

(24)见《曝书亭集》卷五十三《书〈万岁通天帖〉旧事》。

(25)《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四一六页。

(26)顾千里说，见《思适斋集》卷五《〈王摩诘集〉跋》。

(27)北京图书馆藏明范氏卧云山房抄本，正集名《刘宾客文集》，外集犹称《刘梦得外集》，见《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卷六。可惜“董影”缺宋氏后序，无从质证。

(28)《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见“董影”卷二十三、“徐影”卷十九。

(29)见《白氏长庆集》卷六十八。

(30)见《景文集》卷二十四。

(31)见《刘宾客嘉话录》。

(32)郭璞《游仙诗》此句见钟嵘《诗品》卷中引。

(33)陆貽典康熙五年（一六六六年）校宋本《管子》跋，见《皕宋楼藏书志》卷四十二。

（下转52页）

清晰明显，由左至右书写方便。拼写规则也更加规律化，更加简单化了。

总之，这套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是一套便于工农学习，能够继承前人文化，具有民族特点，便于国际文化交流，利于目前使用，利于将来发展的拼音文字方案。它以词素为单位，定音、定义、定形；在文字表音的结构上主要标明声、韵、调，不取纯音素化；少数同音易混的单音节同音词素的拼音文字，在最后增加一个区分字母，作为从书写上的区分手段。我们选择《新华字典》中六千多通用汉字进行逐个研究，把在汉语的构词、造句中不会混淆的同音词素进行归并，以减少拼音文字的数量；把在汉语的构词、造句中出现混淆的单音节同音词素提取出来，分别增设区分字母，从字形上加以区分。对于超出定型范围的古字、冷僻字，一律采用基本拼式前面加短横，同时加注释的方法处理，以此来完成拼音文字的定型规范，保证这套拼音文字立即能够和汉字并行过渡，并在使用中逐步促进全国语音的统一。

这套汉语拼音文字已在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和文盲的初步实践中证明，它既能使人们很快掌握运用，又能继承我国悠久的文化遗产。文盲经过一个月的学习，就可以阅读全部新文字，向广大群众宣读用新文字书写的中共中央文件，还可以写诗歌、短文和书信等。一般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青年，经过一个月的学习，不但可以阅读全部新文字，而且还可以用新文字翻译报刊文章、毛主席著作和鲁迅作品。

我国的文字改革工作，是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敬爱的周总理直接指导下开展起来的。但是，王张江姚“四人帮”却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对文字改革工作进行百般干扰和破坏。粉碎了“四人帮”，文字改革有希望。目前，我们提出的这个试验方案，还是很不完备的，还有不少问题有待于在工农群众的实践中逐步解决。我们也希望有更加完备和理想的方案问世。我们深信，在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的文字改革工作必将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迅猛发展，夺取更大的胜利！

(上接73页)

(34)此诗“董影”在卷二；“徐影”在卷二十一，题目作“《学阮公体》”。

(35)刘禹锡《罢郡归洛阳寄友人》：“平生有已知。”（“董影”卷三，“徐影”卷二十二）那里的“已知”，与此义微不同。

(36)鲁迅语，见《集外集》附录《〈奔流〉编校后记》十。

(37)“徐影”“郡”字右侧脱烂，左侧剩下“君”旁，显然是“郡”字而非“乡”字。

(38)这首诗今所传唐代及宋初选本都没有登载。

(39)《刘氏集略说》，在“董影”卷二十五，“徐影”卷二十。“董影”“徐影”的“誉”字和“深”字下都注有“平”字，而通行本却全删去了。

(40)见两《唐书·地理志》。

(41)见《子刘子自传》，“董影”“徐影”都在《外集》卷九。

(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一一八页。

(43)《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一五九页。